

# 高丽文化在宋朝的认知度与接受度 ——地域与阶层在认知与接受域外文化上的差异

吕肖奂

(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从地域上讲,宋朝沿海港口地区是海外贸易集散地,外来人与物远远多于内地偏远地区,外来文化及观念都在这些地区首先产生影响。生长于沿海地区的人以及到这些地区游览、任职的官僚文人,都首当其冲地感受或接触到海外文化。明州与泉州等浙闽地区在宋朝是高丽物质文化最为流行、最先被认知接受的前沿,可以代表高丽文化在宋朝被认知和被接受的深广度。从阶层上讲,宋朝诗人所代表的士大夫文人,在认知与接受高丽文化上最为从容和理性,他们认知接受的深度与广度,可以体现整个宋朝文化界对高丽文化认知和接受的深广度。

**关键词:**宋代沿海地区;宋代诗人;高丽物品;高丽文化;认知度;接受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1)02-0049-07

## Korea Culture's Cognition Degree and Acceptance Degree in the Song Dynasty

——Difference of Region and Class in 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Foreign Culture

LV Xiaohuan

(Institute of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Geographically speaking, coastal port areas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overseas trade centers. Foreign people and things in coastal port areas were far more than in domestic remote areas, foreign culture and ideas had an impact on these areas. People grown in coastal port areas, government employee and scholars who went sight-seeing and hold an office firstly experienced and contacted foreign cul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Zhejiang and Fujian area such as Mingzhou, Quanzhou, etc., were the fronts where Gaoli material and culture were most popular and were very first accepted. Mingzhou, Quanzhou represented the breadth and depth which Gaoli culture was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in the Song Dynasty. Speaking from the class, scholars whom Song Dynasty poets represented were calm and rational in 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of Gaoli culture, so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ir cognition and acceptance could embody Song Dynasty cultural field's.

**Key words:** coastal port areas in the Song Dynasty;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Gaoli material; Gaoli culture; cognition degree; acceptance degree

虽然宋人颇有收复汉唐故地、建立大一统强大帝国的雄心,如石介《徂徕集》卷二《观棋》所云“安得百万骑,铁甲相磨鸣。西取元昊头,献之天子庭。北入匈奴域,缚戎王南行。东逾沧海东,射破高丽”。

收稿日期:2010-11-2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项目编号:08JJD840193)

作者简介:吕肖奂(1965-),女,河南灵宝人,文学博士,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

城。南趋交趾国,蛮子舆棕迎。尽使四夷臣,归来告太平。”但是这种雄心壮志始终未能实现。宋人只能接受国土缩小的现实,同时也在无奈中逐渐认知并接纳了“四夷”的客观存在,及其大体同质而部分异于“华风”的文化。

在与五、六十个国家与地区的交往中<sup>[1] (P18-61)</sup>,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朝<sup>①</sup>,无疑是除宋之强邻辽、金、夏外,与宋朝相互往来最多的国家。宋与高丽,无论是官方使节往来,还是民间商贾贸易,其繁盛程度,都是其他国家乃至同样深受汉文化影响的日本,无法比拟的。因此研究宋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与其关系稍微平等的高丽入手。

高丽文化属于“汉文化圈”,汉文化的输出与高丽人对汉文化的吸收,在宋与高丽之间的交往中自然非常重要,且已经被双方学界关注<sup>②</sup>。但是双向交流中,高丽文化的输入与宋人如何认知、接纳高丽文化,却很少被研究界涉及。

## 一、海接三韩诸岛近:宋代沿海地区的高丽气息

宋代海上贸易交往基本替代了唐朝及其以前的陆上贸易交往,沿海港口城市因此较内陆地区首先受到海外文化影响。“唐代主要贸易港有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等四大港。而宋代北自京东路,南至海南岛,港口以十数,数量有明显增长。这些港口不再是零星的点状分布,而是受区域经济和贸易状况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广南、福建、两浙三个相对而言自成体系的区域,各区域中港口大小并存,主次分明,相互补充,形成多层次结构。此外,京东路的登州、密州港的贸易一度也有所发展,但存在时间较短,规模也远逊于闽浙等路。”<sup>③</sup>

沿海港口城市是海外贸易集散地,外来人物、物品远远多于内地,外来文化以及观念都在这些地区首先产生影响。生长于沿海以及到这些港口城市所在地区游览、任职的官僚文人,都首当其冲地感受或接触到海外文化。高丽是最亲近宋朝的“海外”。

就连登临海边亭阁楼台、海岛高峰,诗人们都会感受到高丽所去不远而生出一番遐想。苏轼《和人登海表亭》云“谯门对耸压危坡,览胜无如此得多。尽见西山遮岱岭,迥分东野隔新罗。”其所登之海表亭在何处虽已“失考”<sup>[2] (卷四十七)</sup>,但可以令苏轼联想到“新罗”,应该就在北方邻近高丽的海边某处。然而宋人似乎只要到达自北而南海岸线上任何一地,都能感受到高丽的存在,譬如许纶在浙江处州游览仙都山,就听说此山距高丽不远“我来古括经行熟,欲到仙都有底难。漫道蓬莱环弱水,始知方丈近三韩。”最令人诧异的是蔡襄与曾巩,他们在福建沿海,也都说可以望见高丽州岛,如“三韩空琐碎(自注:福人云高峰晴海,见新罗州岛),万落自埃尘”;“莫问吾亲在何处,举头东岸是新罗(自注:福州际海,东海即新罗诸国,《图经》亦云长溪与外国接界)”。这些说法在今人看来难以置信,但宋人深信不疑,让人领略到高丽气息在海岸线上的绵长与浓厚。

沿海港口往往有官方设立的佛寺及海神庙,为往来使节与商人等信奉佛教、海神提供祭祀场所<sup>④</sup>。苏轼知密州时,出使高丽归来的杨景略,建议在密州的繁华商业区板桥建立海神庙,因为他“顷年三韩

① 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朝(918-1392)在宋代(960-1279)诗文中或被称作新罗、朝鲜、高句丽、三韩、鸡林,均沿用旧称,皆指今朝鲜半岛上的北朝鲜和韩国。本文主要以宋代诗歌中的高丽形象为研究对象。

② 参见王水照先生主编《宋代文学通论》之宋代文学与“汉文化圈”,第564-60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金周淳《苏轼对高丽汉诗的影响》,《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658-669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③ 参见黄纯艳《宋代海外贸易》第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宋代海外贸易》第162页“进口品除了在市舶司所在地销售外,主要的销售市场是京城、四川和东南地区。”外来文化通过进口品的交易与消费,在销售区域也会产生一些影响,生活在进口品销售区域的宋人,在消费进口品时也在认知海外的文化。这一点尚需专章探讨。

④ 如《墨庄漫录》卷五云“予在四明时舶局日,同官司户王璩昭都徽往昌国县宝陀山观音洞祷雨,归为予言:宝陀山去昌国两潮,山不甚高峻,……有一寺,僧五六人……三韩、外国诸山在杳冥间,海舶至此,必有祈祷。寺有钟磬铜物,皆鸡林商贾所施者,多刻彼国之年号,亦有外国人留题、颇有文采者。”宝陀山就是现在的普陀山,因为距当时港口城市四明(明州)较近,是各国尤其是高丽商贾往来祈祷之所。《说郛》卷十五下《孙公谈圃》卷上“吕相端奉使高丽,过洋,祝之曰‘回日无虞,当以金书《维摩经》为谢。’比回,风涛辄作,遂取经之。闻丝竹之声起于舟下,音韵清越,非人间比。经沉,隐隐而去。崔伯易在礼部求奉使高丽故实,遂得申公事。故杨康功、钱颉皆写此经过,丰稷为杨掌笈表,言‘东海洋,龙宫之宝藏所也,气如厚雾,虽无风,亦有巨浪,使人卧木匣中,虽荡而身不摇,食物尽呕,唯饮少浆,舟前大龟如屋,两目如日,烛光耀沙上,舟人以此卜之,见则无虞也。’当时使节们信奉《维摩经》沉水,才可以祈求到风平浪静。

使,几为蛟鳄吞”<sup>[3] [P1938]</sup> ,官方非常理解海上往来人的出生入死,因此常常在寺庙为使节或海商们祈风和祭海<sup>[1] [P81]</sup> ,官僚诗人有时是这些活动的主持者,有时会参与或亲眼目睹这种仪式,如王十朋《梅溪集》后集卷十七《提举延福祈风道中有作次韵》云“雨初欲乞下俄沛,风不待祈来已薰。瑞气遥看腾紫帽,丰年行见割黄云。大商航海蹈万死,远物输官被八垠。赖有舶台贤使者,端能薄敛体吾君。”从中可以看到官僚诗人对海外贸易的认识与观念,已经不同于传统的儒家薄商传统。身处于海外贸易前沿的官僚士大夫,观念上也会有些改变,这可以看作是港口海外文化盛行的一点影响。

京师与沿海港口城市以及高丽使臣沿途经过的各地,一般设有高丽馆,专门接待高丽使节<sup>①</sup> ,有些亭馆修建得颇为奢华。苏轼《元丰七年有诏京东、淮南筑高丽亭馆,密、海二州骚然有逃亡者。明年,轼过之,叹其壮丽,留一绝云》:“檐楹飞舞垣墙外,桑柘萧条斤斧余。尽赐昆耶作奴婢,不知偿得此人无。”<sup>[3] [P1378]</sup> 苏轼反对神宗时期高规格接待高丽使臣,所以对其劳民伤财颇有异议。但王安石对海外贸易显然有浓厚的兴趣,他应该是神宗时期恢复宋与高丽关系的积极倡导者。熙宁元丰高规格接待高丽使臣以及各地修建高丽馆,应该出自他的建议。王安石《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忆江阴见及之作》云“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sup>[4] [P436]</sup> 描写的江阴黄田港口是一片繁华之地,繁荣的海外贸易自然是他十分乐意看到的景象,所以他为不能到那边港口做官而感到遗憾。作为新、旧党代表的王安石与苏轼,对海外关系与海外贸易的认识与态度有如此大的差异,可能与他们生长的东南沿海与西南内陆的环境有关。

港口城市浓厚的海外气息,让生长于其中的官僚诗人深受熏染。明州是高丽进入宋朝的最主要港口,生长于明州的楼钥、史浩等人,对高丽以及明州的海外关系贸易就十分关注,《攻媿集》卷五十七《沿海制置司参议厅壁记》云“四明为东南大邦,海市三垂,北通海岱,东控高丽、日本诸国。高皇南巡,驻蹕临安,尤为控扼要地。始置沿海置制使,寻命守臣兼之,凡闽浙淮东濒海之州皆隶焉。”史浩《鄞峰真隐漫录》卷十四《代人谢除知明州表》:“矧四明庶富之邦,实三韩扼控之地。”卷二十四《贺李显谟知明州启》:“乃四明洞天之地,东连溟渤,接三韩箕子之乡。”地缘使他们都颇关注海外尤其是高丽的文化。据《宝庆四明志》卷三《库务》记载,宋代明州港口用杜甫《洗兵马》作进口商品仓库名“寸地尺天皆入贡,奇祥异瑞争来送。不知何国致白环,复道诸山得银瓮。”这种商业与诗歌结合的气氛,无疑滋养着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他们对家乡的地理环境商业气氛从小就耳濡目染,因此能够对高丽及海外文化抱着开明的态度。

为官以及到过明州的人,也都能感受到那里的高丽及海外气息。范成大《石湖诗集》卷二十一《初赴明州》云“四征惟是欠东征,行李如今忽四明。海接三韩诸岛近(自注:昌国县图障于海中,题字云:自此与高丽国接界。盖宇内极东处也)江分七堰两潮平。”与高丽接壤,使得范成大在明州期间就关注高丽问题。到明州游览的陈造,登招宝山赋诗云“一鹫风烟上,三韩指点中。地随山共尽,天与水无穷。”毛珣送人过四明,立刻想到其文名会像白居易那样远播高丽“从此文名沧海阔,好风三日到鸡林。”<sup>[6]</sup>

除了四明外,沿海不少城市港口都充满高丽以及海外气息,杨蟠称赞温州云“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人唤小杭州。”<sup>[1] [P222]</sup> 引苏轼《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云“窃闻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sup>[5] [P858]</sup> 这些气息让身临其境的人或多或少地关注到海外贸易,并引起思考或向往。赵汝适提举福建路市舶时所作《诸蕃志》就是身在其地而关注海外贸易之作。

沿海地区的海外观念,影响最大的可能是中下层百姓。姚勉《雪坡集》卷十九《赠邮文秀才》云“尚欲效学鸡林商,遍索伟制丰行装。”从唐朝就建立起声名的鸡林书商<sup>②</sup> ,在宋朝依旧是营销书籍最为成功的商人,他们的成就鼓励影响到宋朝“秀才”们,使宋朝的“秀才”们也弃学从商,做起文化贸易。姚勉

① 这些亭馆在高丽使节不到时,也会接待国内官员,如张耒《柯山集》卷六《离楚夜泊高丽馆寄杨克一甥四首》就是如此情形。

② 1919《旧唐书》卷166《白居易传》云“又鸡林贾人求书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伤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雪坡集》卷二一还有一首《赠王生》,是为一位“能雕能染”的手艺人却转学“邨文”而作“三年刻楮多苦心,不龟手方只百金。近来自笑巧成拙,舍去二艺趋鸡林。”可以看到高丽书商文化对宋朝的影响。江湖诗派诗人生活或游走于浙江、福建的沿海,对高丽等海外文化及其影响程度最有感受。

还有不少农民受到海外文化影响而转为海商,刘克庄《后村集》卷十二《泉州南郭二首》云:

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唯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莫陶朱。

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

泉州作为港口城市,其开放的商业观念与外来文化,致使附近南郭村的农夫樵夫不再以耕樵儒业为本,儒家传统思想受到极大冲击,而外来的商业观念影响的是新的生活观念与追求。姚勉、刘克庄等士人对此表示惋惜和不解,表明士大夫文人还在坚持儒家正统耕读生活观念,然而,百姓的观念改变之大,却表明海外商业文明首先渗透到宋朝社会的底层。

高丽及其代表的海外商业文化,首先在宋朝沿海城市地区流行,在那里,无论是官僚文人还是底层秀才、手艺人、农民都能感受到其冲击力。短期的观感或长期的濡染,以及所处的阶层差异,影响到每个人对高丽文化的认知、接受程度。尽管认知接受程度不同,但高丽气息以及海外文化在沿海地区的流行度与接受度,无疑处于整个宋朝的前沿。

## 二、海上人烟来眼界:宋朝诗人对高丽物质文化的认知与接受

对于足不出国门的绝大多数宋人而言,高丽物产无疑是他们认知、接受高丽文化最为直接的渠道。宋朝诗人们对高丽物产的认知与接受从容而理性,他们在对待域外文化的态度上,不像普通民众那么轻易,也不像商人那样功利,因此,他们的态度不仅代表了士大夫文人也代表宋朝官方对高丽文化的认知度与接受度。

高丽的文房用品、佛教用品、日常用品、土特产以及工艺品,乃至绘画音乐,进入诗人的视野,成为诗人们歌咏的对象。对于好学的宋代诗人而言,高丽物产带给他们的是比书本更为直接可感的丰富知识。诗人们对高丽物产及其承载的文化认知与接受可分四个方面。

与普通受众一样,诗人们首先认知与接受的是高丽物品的实用性。进口的高丽物产大多是实用品,与从东南亚各国进口的奢侈品颇不同,因此首先被宋人认知接受。尤其是文房物事,其使用价值最先呈现。韩驹得到友人馈赠的高丽纸墨,赞赏酬答之后便立即使用“引纸磨墨寒生风。”<sup>①</sup>杨万里曾经看到蔡襄、欧阳修留存在高丽纸上的笔迹“三韩玉叶展明罽,诸老银钩卷碧鲜。”<sup>[6](卷二十四)</sup>高丽纸墨与宋代书法家的墨宝一样珍贵,因此文人们对其十分珍惜,高丽纸常被送给大书法家求其墨宝,黄庭坚就多次受到这种求赠<sup>②</sup>。高丽笔也是文人珍重使用的文具,何去非《次韵翟公巽猩猩毛笔》云“数管友十年,闭门赋《三都》。”这些近于“华风”的物品,其实用性对宋代文人来说并不陌生。高丽的日用品如高丽盆、瓶也深受欢迎,如苏轼就将其喜爱的仇池石“盛以高丽盆,藉以文登玉”,并于其下自注云“仆以高丽所铸大铜盆贮之,又以登州海石如碎玉者附其足。”<sup>③</sup>以表示石与盆、玉俱贵。高丽土特产,也被更多宋人认识且消费。南宋诗人笔下描述的有新罗参(紫团参)、高丽松花、新罗松实这些土特产。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谢岳大用提举郎中寄茶果药物三首》中写到高丽紫团参“入手截来花晕紫,闻香已觉玉池肥。旧传饮子安心妙,新捣珠尘看雪飞。”张栻《南轩集》卷三《李仁甫(焘)用东坡寄王定国韵赋新罗参

① 韩驹《陵阳集》卷一《谢钱珣仲惠高丽墨》。高似孙《剡录》卷六上《剡碓》引《鸡林志》曰“高丽纸治之紧滑,不凝笔,光白可爱,号白碓纸。”

② 《山谷外集》卷十《与王立之四帖》:“高丽纸得暇即写。”《山谷集》卷二十九《跋与徐德修草书后》:“又送高丽墨三丸,皆六年随贡使精品也。德修耽玩笔墨,甚于嗜欲,其为求予书,乃能顿舍世间深重恩爱。”

③ 《东坡全集》卷十六《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东坡全集》卷三十九《万石君罗文传》云“其后于闐进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风赐之,并赐高丽所献铜瓶为饮器,亲爱日厚,如纯辈不敢望也。”高丽铜器精美实用,是神宗、哲宗朝深受宋人欢迎的进口产品。

见贻亦复继作》：“美荫背幽壑，灵根发奇颖。艰难航瀚海，包裹走湖岭。……愿持紫团珍，往扣黄庭境。……悬知药笼中，此物配丹鼎。从今谈天舌，不用更浇茗。”可知高丽参在南宋时已成为士大夫十分珍视的药品与补品。曾几《茶山集》卷三《谢柳全叔县丞寄高丽松花》“三韩华萼手自开，其间琐碎如婴孩”描写到可以食用的高丽松花。而高丽松子在宋朝比松花更长久流行。宋初陶谷《清异录》卷上《玉角香》云“新罗使者每来，多鬻松子，有数等：玉角香、重堂枣、御家长、龙牙子。”松子即松实，到了南宋，依然是受人欢迎的高丽物产。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谢岳大用提举郎中寄茶果药物三首》其三即题写高丽新松实如何受到当时人们的欢迎“酒边膈膊牙车响，座上须臾漆櫺空。”高丽物品的实用性，首先得到诗人们的认知与接受。诗人们与普通百姓不同的是，他们在实用性之外，还能够认知与接受的是高丽物品的观赏或赏玩性。

异域物品毕竟为数不多，物以稀为贵，因此对于大多数诗人而言，高丽物品如同其他珍玩，且因产地遥远，能激发出他们更大的玩赏情趣。梅尧臣的“且作异土玩”<sup>[7] (P426)</sup>，也即孔武仲《内阁钱公宠惠高丽扇，以梅州大纸报之，仍赋诗》所云的“但将远趣醒耳目”（《清江三孔集》卷六），代表宋诗人对待高丽物品的基本态度。对于梅尧臣而言，新罗墨像“西域筇”一样，都是异域舶来的稀见物品，只能作为珍品把玩<sup>[7] (P426)</sup>。张耒《柯山集》卷六记载了一次休沐日鉴赏高丽墨的小型文人雅集《休日同宋遐叔诣法云，遇李公择、黄鲁直。公择烹赐茗，出高丽盘龙墨，鲁直出近作数诗，皆奇绝。坐中怀无咎有作呈鲁直、遐叔》在宁静的寺庙中，高丽的盘龙墨与黄庭坚的诗歌一样，成为诗人与僧人们品尝御赐佳茗时最好的把玩对象“黄子发锦囊，句有造物功。握中一寸煤，海外千年松。”鉴赏异域物品成为宋代文人生活中的雅趣之一。毕仲游也记载了一次友人专邀的品赏书帖文玩的活动“珍怪渐倾写，宝墨来三韩。”<sup>[8] (卷十八)</sup>孔武仲《内阁钱公宠惠高丽扇，以梅州大纸报之，仍赋诗》云“得公团扇未及用，挂向空堂神骨清。但将远趣醒耳目，不独暑月排歎蒸。”高丽扇更重要的价值是可以远观怡神。这种品鉴异域珍玩的文人雅趣，与普通百姓消费是颇为不同的，所谓“期为高人知，匪效男女欢”<sup>[6] (卷十八)</sup>。因此高丽物品及其承载的高丽文化对诗人们来说，其认知与领受程度要比一般民众高。

诗人们往往在玩赏之余，对这些异域物品赋诗称赞。新罗墨、高丽猩猩毛笔、三韩纸等文房物事，被视为异域珍品而在诗人的笔下熠熠生辉。诗人书写最多的是高丽墨。梅尧臣庆历八年得到祖无择惠赠的高丽墨，以间杂“怪巧”的笔法写诗酬答“海上老松死，霹雳烧瘦龙。胡人犀皮胶，团煤烟膏浓。色夺阳乌翅，来涉溟渤重。”神化了高丽墨的制作原料、质地及工艺。江西诗派诗人韩驹、谢薖都曾为新罗墨作诗，由谢薖《竹友集》卷三《陈循中求赋高丽墨诗为作长句》，可知为高丽墨赋诗在北宋后期已经成为文人的一种时尚。钱勰以出使带回的高丽猩猩毛笔写五古首唱，黄庭坚、孔武仲同时以五古赋和，黄庭坚另有二首七绝戏咏，苏辙次韵，这是关于高丽猩猩毛笔的首次唱和，高丽毛笔因这些声名卓著的诗人而声名远播<sup>①</sup>。后来的翟公巽、何去非也曾为猩猩毛笔赋诗<sup>②</sup>，而韩驹“王卿赠我三韩纸，白若截肪光照几。钱侯继赠朝鲜墨，黑如点漆光浮水”是同时对高丽纸与墨的夸赞。黄庭坚“猩猩末笔鱼网纸，松柎织扇清相似”更在称赞高丽松扇时顺带称赞了高丽纸、笔皆清雅可玩。北宋时期诗人吟咏高丽文房用品的诗歌颇多，且在神宗、哲宗、徽宗朝不断掀起高潮。由此也可推知，北宋中后期高丽文具在宋朝文人间流行的程度。诗人们还对制作精良、深受高丽与宋朝高僧们欢迎的高丽磨衲称道不已，如李彭《日涉园集》卷十《游云居四首》云“鸡林磨衲度帙沟，海外风烟在上头。针孔线蹊谁善幻，千岩万壑斩新秋。”曹勋《松隐集》卷二十八《施磨衲与惠因长老》云“宝华絜缛并文绮，金针细衲成帖相。衣衲一如来法，一一针孔藏妙用。经历百千无退转，佛光律仪不曾失。”在这些称颂中，可以看出高丽手工业水平的

① 钱勰原唱不存。《山谷集》卷九《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清江三孔集》卷五孔武仲《猩猩毛笔与黄鲁直同赋》；《山谷内集诗注》卷三《戏咏猩猩毛笔第二首》注云黄庭坚有跋；苏辙《栎城次韵一首》。

② 《墨庄漫录》卷五“翟三丈公巽少年侍龙图出守会稽时，尝赋猩猩毛笔，诗甚奇妙，何去非次韵和之云。”

高超,也可知诗人们的认知度。高丽的画作与音乐、乐器也受到宋人关注<sup>①</sup>,譬如高丽音乐曾在神宗元丰五年元宵节朝廷庆贺宴会时,由高丽人进奏<sup>②</sup>,群臣应制神宗的诗歌中曾提及此事,王珪有“一曲升平人尽乐,君王又进紫霞杯”之语,王安礼也有“凤阙张灯天上坐,鸡林献曲海边来”<sup>③</sup>。《挥麈录》后录卷七“元祐初(当为元丰末)杨康功使高丽,别禁从,诸公问以所委,皆不答。独蔡元度曰‘高丽磬甚佳,归日烦为置一口。’不久康功言还,遂以磬及外国奇巧之物遗元度甚丰,他人不及也。”蔡卞在当时能够知道高丽磬很好,这说明他对高丽一些乐器、器乐颇有点研究。

高丽扇既是实用品又是可以把玩的物品,深受诗人们喜爱,苏门师友在接受钱勰馈赠的高丽松扇后,有一次规模颇大的唱和,钱勰首唱,张耒、苏轼、黄庭坚、孔武仲<sup>④</sup>纷纷和诗,现存诗尚有六首,据其诗描述所看,钱勰送给朋友们的高丽扇是质地为松柎、样式为圆团的扇子<sup>⑤</sup>。此后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十六有《冯远猷家高丽松扇》,描述到扇面有“双鸾织花大如月”,则松扇与画扇颇有相似之处,二者都有“画”,只是松扇之“画”非画出,而是织出,这是松扇与画扇的区别。黄庭坚《山谷集》卷九《谢郑闾中惠高丽画扇二首》之二描写的就是画扇“蕲汀游女能骑马,传道蛾眉画不如。”这种画扇可以呈现高丽的绘画水平。而华镇《云溪居士集》卷九《高丽扇》云“排筠贴楮缀南金,舒卷乘时巧思深。何必月团裁尺素,自多清爽涤烦襟。挥来振鹭全开羽,叠去拼榈未展心。利用已宜勤赏重,更堪精制出鸡林。”描写的则是折叠纸扇<sup>⑥</sup>。高丽三四种扇子都进入诗人的视野,留给诗人的印象是高丽手工制作技艺精湛、手工制品玲珑精巧。

认知与接受高丽物品的实用性、观赏性的同时,诗人们还能联想到高丽自然风貌、高丽的佛教及各方面的文化,加强认知接受的深度广度。孔武仲诗“大荒茫茫最宜松,直从旷野连深宫。听声卧影已不俗,况作团扇摇清风”就从松柎团扇的制作联想到高丽漫山遍野的松树。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谢岳大用提举郎中寄茶果药物三首》其三所云的“三韩万里半天松,方丈蓬莱东复东。珠玉炼成千岁实,冰霜吹落九秋风”,也在食用松实时,联想到万里仙山之外有着高入云天的松树的高丽。高丽磨衲,让诗人们联想到高丽佛教文化的兴盛以及两国佛教的同源与交流,曹勋《松隐集》卷二十八《施磨衲与惠因长老》:“三韩山川悉汉地,其中佛法亦复然。王子义天不思议,剪除须发作佛事。”韩驹《陵阳集》卷一《谢钱珣仲惠高丽墨》:“殷勤二物从来远,裨海环瀛眼中见。若欲挥写藏名山,不如却作谈天衍。”高丽物品引发人们对高丽的想象,并成为诗人们聊及海外的谈资。这是诗人们在认知、接受高丽物品时能够达到的高于普通受众的又一境界。

此外,对于好学深思的宋代诗人而言,高丽器物是他们获得异域知识的重要源泉,格远物而致深知,胜于读书,黄庭坚《山谷集》卷九《谢郑闾中惠高丽画扇二首》云“海上人烟来眼界,全胜博物注鱼虫。”在黄庭坚与一些诗人看来,“宝扇真成集陈隼,史臣今得杀青书”,远方的器物如同“集陈隼”、“杀青书”一样值得仔细研读。宋人在仔细研读高丽器物时,探究其利弊优劣,并加以改良。譬如高丽人用老松烟

①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六《高丽国》云“至于伎巧之精,他国罕比,固有丹青之妙。钱忠懿家有着色山水四卷、长安临潼李虞曹家有本国八老图二卷。及曾于杨褒虞曹家,见细布上画行道天王,皆有风格。”

② 此事《侯鯖录》卷二《韵语阳秋》卷二等均有记载。高丽献乐多次。《宋史》卷487:“熙宁九年,复遣崔思训来,命中贵人仿都亭西驿例治馆,待之寝厚,其使者亦益多,尝献伶官十余辈,曰夷声,无足观,止欲润色国史尔。”

③ 王珪《华阳集》卷四《恭和御制上元观灯》;王安礼《王魏公集》卷一《恭和御制上元观灯》。

④ 详见《东坡全集》卷十六《和张耒高丽松扇》,黄庭坚《戏和文潜谢穆父松扇》以及《次韵穆父赠高丽松扇》二首,孔武仲《清江三孔集》卷六《钱穆仲有高丽松扇,馆中多得者,以诗求之》、《内阁钱公宠惠高丽扇,以梅州大纸报之,仍赋诗》二首。

⑤ 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二十九云“松扇,取松之柔条细削成缕,撻压成线,而后织成,上有花文,不减穿藤之巧。唯王府所遣使者最工。”王云《鸡林志》云“高丽松扇,揭松肤柔软者缙成,文如樱心,亦染红间之,或言水柳皮也。”邓椿《画继》卷十杂说“高丽松扇如节板状。其土人云非松也,乃水柳木之皮,故柔腻可爱。其纹酷似松柏,故谓之松扇。东坡谓高丽白松理直而疏,析以为扇,如蜀中织棕桐心,盖水柳也。”三人对高丽松扇的质地与工艺介绍不同,可知当时宋人对高丽松扇质地工艺还不够熟悉了解。

⑥ 邓椿《画继》卷十《杂说》所云“又有用纸而以琴光竹为柄,如市井中所制折叠扇者,但精致,非中国可及。展之广尺三四,合之止两指许。所画多作士女乘车跨马,踏青拾翠之状,又以金银屑饰地面,及作云汉星月人物,相有形,似以其来远,磨擦故也。其所染青绿奇甚,与中国不同,专以空青海绿为之,近年所作,尤为精巧。”

(又称松煤)与麋鹿胶(或犀皮胶、鹿角胶)制墨,虽然好用,但到北宋神宗、哲宗时期,苏轼等文人认为“高丽墨若独使,如研土炭耳”<sup>[5] [P2229]</sup>,而墨工潘谷、文人兼墨工苏泚(浩然)等人也嫌高丽墨黑而不亮,因此他们将高丽墨打碎,取其松烟之长,而融入国产材料中制墨,墨色更佳绝,是为贡品。苏轼《孙莘老寄墨四首》之一云“徂徕无老松,易水无良工。珍材取乐浪,妙手惟潘翁”,就对“潘谷作墨,杂用高丽煤”<sup>①</sup>称道不已。这种融合高丽与宋朝材料工艺之长的墨,也深得高丽人喜爱“神庙朝,高丽人入贡,奏乞浩然墨。诏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进呈之。”<sup>[9] (卷八)</sup>文人与墨工共同的改造,成就了宋丽文化交流史的一段佳话,宋代诗人不断传颂,如韩驹云“旧传绩溪多老松,奚超既死松亦空。易水良工近名世,真材始不归潘翁”<sup>[10] (卷一)</sup>,是对苏轼那首五言诗的夺胎换骨。谢适《竹友集》卷三《陈循中求赋高丽墨诗为作长句》:“老松收烟琢玄玉,可试洮州鸭头绿。来从万里古乐浪,传到麻源第三谷。要须岱郡鹿角胶,捣成方解土炭嘲。请君摩研新诗作,一弄潺湲吊康乐。”更将工艺改良的佳话变成了典故。差不多同时,黄庭坚也记录了笔工吕大渊改造高丽猩猩毛笔一事<sup>②</sup>。两则改造高丽笔墨的故事,让我们了解到宋代文人在文具制作使用上精益求精的程度,更了解到宋人对待外来物品能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性接受态度。

由初步接触高丽物品的实用性,到了解其玩赏性,再到进一步联想到高丽风光与文化,最后到理性地去粗取精,宋代诗人对高丽物质及其文化的认知接受可谓步步深入。宋代诗人们能够一定程度改变对海外“蛮夷”的轻蔑心理,而自愿自觉提升对高丽文化的认知度接受度,在那个华夷大防的年代实在难能可贵。

对异域文化的认知度与接受度,取决于异域物品的流程度以及流行地域,更取决于接受者的心理、眼界及其文化素质。沿海地区代表异域文化在宋朝最为流行的地域,而诗人则代表异域文化接受者的最高文化层次,二者体现的是整个宋朝对高丽文化认知与接受的最高程度。

#### 参考文献:

- [1] 黄纯艳. 宋代海外贸易[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2] 查慎行. 苏诗补注[M]. 四库全书本.
- [3] 苏轼. 苏轼诗集[M]. 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4] 王安石. 王荆文公诗笺注. 李壁笺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5] 苏轼. 苏轼文集[M]. 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6] 杨万里. 诚斋集[M]. 四库全书本.
- [7] 梅尧臣.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M]. 朱东润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8] 毕仲游. 西台集[M]. 四库全书本.
- [9] 何 蘧. 春渚纪闻[M]. 四库全书本.
- [10] 韩 驹. 陵阳集[M]. 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 张立荣 汪群红)

① 《东坡全集》卷十四《孙莘老寄墨四首》之一自注。苏轼《书王君佐所蓄墨》又云“今时士大夫多贵苏浩然墨,浩然本用高丽煤杂远烟作之。”

② 1994《山谷别集》卷六《笔说》云:“大渊又为余取高丽猩猩毛笔解之,括去倒毫,别捻心为之,率十得六七,用极善。乃知世间法,非有悟处,亦不能妙。”